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新 书

方向东 译注



中華書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方向东◎译注

新书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书/方向东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2.10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8828 - 1

I. 新… II. 方… III. ①政书 - 中国 - 西汉时代
②《新书》 - 注释③《新书》 - 译文 IV. ①D691.5②23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9763 号

-
- 书 名 新 书
译 注 者 方向东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¼ 字数 250 千字
印 刷 1 - 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28 - 1
定 价 25.00 元
-

前 言

一、贾谊传略

贾谊，洛阳(今河南洛阳)人，生于汉高帝七年(前 200)，卒于汉文帝十二年(前 168)，汉初著名的大儒。他在为官期间，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提出了许多治国方案，具有远见卓识。在思想方面，他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完成了向汉代中期董仲舒新儒学的过渡。在文学方面，他的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骚体赋，开了汉代散文赋的先河。因此，将贾谊誉为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实不为过。

贾谊出生时，战国时期封建割据局面已经结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王朝——秦王朝，在全国农民起义的大风暴中崩溃了。大一统的西汉王朝，需要一种加强对人民全面控制的思想体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毁灭暴行，汉高祖不事诗书、以儒冠为溺器的文盲统治，已不能适应历史前进的潮流。注重休养生息的黄老“无为而治”思想应运而生。这种思想，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了条件，促使人民生活比较安定，也促使了封建统治秩序渐行巩固。文化上的专制也放松了，“孝惠之世，除挟书之律”。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氛围，为贾谊登上政治舞台开拓了良好的环境。十八岁的贾谊就以诵读儒家诗书和长于属文

闻名于当地，先后受学于李斯的学生吴公及荀况的学生张苍。二十二岁时，已“颇通诸家之书”。在文帝荐举贤良方正的政策下，他经吴公的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博士是备皇帝顾问的官员，他因此有了机会参与朝政。他年少博学多才，许多先生不能回答的问题，他都代为应对。文帝很赏识他的才能，一年内就破格提升为太中大夫，秩比千石。贾谊受到重用，便利用机会提出了许多改革制度、更定法令的建议，“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见他年轻有为，曾想把他提到公卿的位置，却遭到权贵保守派绛侯周勃、丞相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的嫉忌、排斥与诽谤，说他“年少初学，专欲擅能，纷乱诸事”。文帝因此疏远了他，不采用他的奏议，派他做长沙王太傅。从秩禄说，由太中大夫的比千石到长沙王太傅的二千石，是升官，实际是明升暗降。一离开朝廷，他就失去了施展自己政治才华的机会，标志着仕途走下坡路。于是过湘水，作《吊屈原赋》以自喻；任长沙傅三年，作《鹏鸟赋》以自广。

文帝没有忘记贾生的才华，又惑于鬼神之事，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在未央宫的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本。贾谊一一道其所以然，以至夜半，文帝前席，但又不委他重任，只是派他任小儿子梁怀王的太傅。唐代李商隐作《贾生》诗慨叹说：“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文帝用贾谊，是因为重其才；而不重用，固然因为朝廷保守势力的排挤，更与文帝实行“无为而治”的治国指导思想有关。随着汉政权的逐步巩固，新的矛盾和危机开始出现：同姓王的“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王国势力凌驾朝廷；“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匈奴对汉无止境地嫚侮侵掠；“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商人豪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经济、政治的需要。贾谊看出了这些矛盾和危机，大声疾呼变“无为”为“有为”。这是文帝

与他治国指导思想的根本分歧所在,是他不被重用的根本原因。

梁怀王是文帝宠爱的小儿子,地位比长沙王高得多;国都在中原,离长安不远。比起长沙来,贾谊的处境大为改善了。在任梁怀王太傅期间,贾谊针对当时“匈奴强,侵边;天下初定,制度疏阔;诸侯王僭僭,地过古制”的形势,“数上疏陈政事,多欲有所匡建”。今传《陈政事疏》(或称《治安策》)的大部分,就是这个时期写的。

文帝前元十一年(前169),梁怀王不幸坠马死。《史记》、《汉书》本传都说贾谊哀伤自己做太傅不称职,常哭泣,一年后亦死。梁怀王死后,贾谊上《请封建子弟疏》,他根据梁怀王死后当时诸侯力量对比关系做了一个有利于国家统一的调整方案,被文帝采用。从这些事实,看不出贾谊有悲观、怨望的情绪。梁怀王坠马死,是偶然失足。贾谊的伤心哭泣,恐怕不仅是因为对不起文帝的重任,或是相信鸛鸟入舍之说,更是因为他的教育思想的破灭。因为他认为:“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保傅》)梁怀王一死,他恐怕再没有被重用的机会,远大的政治抱负,更难以实现了。

贾谊短暂的一生,却给我们留下不少作品:赋有《吊屈原赋》、《鵬鸟赋》、《旱云赋》、《簏赋》(残)、《惜誓》(或云屈原原作);疏有《陈政事疏》(或云《治安策》)、《论定制度与礼乐疏》、《论积贮疏》、《陈铸钱疏》、《上都输疏》、《谏立淮南诸子疏》、《请封建子弟疏》;政论文有《过秦论》等。今传《新书》十卷,是后人据他的疏文等整理而成的。

刘歆说:“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汉书·楚元王传》)刘向说:“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鲁迅说,贾谊的作品“与晁错之《贤良对策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这些都是对贾谊的正确评价。

二、《新书》的内容与贾谊的思想

《新书》的书名和卷数，历代著录不一。《汉书·艺文志》云《贾谊》五十八篇，未提卷数。《隋书·经籍志》云《贾子》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云《贾子》九卷，《崇文总目》云《贾子》十九卷，《直斋书录解题》云《贾子新书》十卷，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新书》十卷。孙诒让说：“《新书》者，盖刘向奏书时所题，凡未校者为故书，已校定者为新书。”（《札迻》卷七）汪中亦云：“称《新书》者，刘向校录所加。荀卿子称《荀卿新书》，见于杨惊之序，是其证也。”

关于篇数，《汉书·艺文志》提五十八篇，北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本七十二篇，刘向删定为五十八篇”。这可能是根据刘向《别录》（已佚）的材料，已无从详考。南宋王应麟《玉海》记载的《新书》目录，与今本《新书》相比，除《过秦论》只分上下两篇，《连语》作《昭纪·连语》，《谕诚》作《谕诫》，《退让》作《退逊》外，余则相同。明何孟春《贾太傅新书订注》和周中义《子汇》本有《审取舍》一篇，乃《汉书·贾谊传》中自“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至“人主胡不引周秦事以观之也”一段文字。孙钦善《〈过秦论〉分篇考》认为只分上下两篇（见《文史》第三辑）。

《新书》五十八篇，亡佚《问孝》、《礼容语上》两篇，今存五十六篇，分十卷。卷一至卷四（《过秦上》至《铸钱》）为“事势”类，皆为文帝陈政事。卷五至卷八（《傅职》至《道德说》）为“连语”类。卷九（《大政上》至《修政语下》）四篇不标目（《玉海》标“杂事”）。卷十（《礼容语上》至《立后义》）为“杂事”类。“连语”、“杂事”两类或为太傅时所用的教材和笔记，或释经传古义，或草创仪法，与“事势”类陈政事不同。

《新书》反映了贾谊丰富的政治、经济、教育、哲学思想，而政治思想最为突出。

贾谊的政治思想，既不同于孔子的“从周”、“好古”，也不同于商鞅的反对“法古”。贾谊在《过秦论》里说：“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

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这就是他的政治主导思想。

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洞察现实生活的矛盾，贾谊在《新书》里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治国框架：即以仁义为经，以礼节为纬，以法为辅，建立一个天地与人世万物和谐统一的国家：诸侯附亲轨道，致忠而信上；兵革不动，民长保首领；匈奴四荒，乡风慕义，乐为臣子；天下富足，资财有余，民素朴顺而乐从令；官事甚约，狱讼盗贼鲜有；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万生遂茂（《数宁》）。这是他的理想王国的生动描绘。

《数宁》篇表明，这个治国框架是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何以为之？必须以“仁义”为根本进行治理。这种思想，是在分析总结秦王朝的兴衰盛亡的基础上得出的。他接受了陆贾“逆取”、“顺守”的主张，认为秦之速亡是由于“仁义不施”的结果。《过秦中》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不仅秦王不行仁义，二世也是如此。二世“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过秦中》）。并为二世和子婴作了一些治国设想，可是“三主之惑，终身不悟”，因此亡国是必然的。

孔子说：仁者爱人。施仁义的对象是广大人民。民安才能治国，所以说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过秦中》）；也只有民安了，才能讲礼义，“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可见仁义治国，必须爱民，以民为本。《新书》中的民本思想十分突出，除《过秦》上、中、下三篇外，更突出地表现在《大政》上、下两篇中。《大政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并且从国家的安危、存亡、兴盛、功业四个方面都取决于人民，论证了“民为国本”的道理。指

出民心的向背,民力的重要,统治者不可不察。不仅秦王朝的兴衰史证明这一点,春秋时许多国家的兴亡也证明这一点(见《春秋篇》)。民本思想,起源很早,《尚书》里就有表现。《虞书·皋陶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已指出天之所行,皆通过民来表达,民已成为天意之代表。《周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也是以人民为国家根本之意。孔子的政治主张,首先在爱民。樊迟问仁,子曰爱民(《论语·颜渊》)。这种爱人即为仁的思想,发展到后来,孟子直接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孟子·尽心》)。荀子把君比作舟,把民比作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荀子·王制》),也是民本思想的继续发展。贾谊吸取了他们的思想,但不论是在对人民力量的认识上,还是在安定人民的办法上,都比前人更为深刻,更为全面具体。他进而提出了以是否爱民作为衡量国家政治的标准,直接治理人民的是吏,那么吏治如何,可见民治如何,亦可见君治如何。《大政下》说:“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又说:“民之治乱在于吏,国之安危在于政。”并主张人民参加对吏的选举:“明上选吏焉,必使民与焉。故士民誉之,则明上察之,见归而举之;故士民苦之,则明上察之,见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后和之。”以人民的好恶作为取吏的标准。政府官吏应“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大政上》)。他劝告君主,只有把广大人民的生活安顿好,无衣食之虞,统治才能稳固。否则,“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孽产子》)。在《忧民》、《无蓄》两篇,提出“蓄积”政策,也是从人民生活的角度,来表现他的民本思想的。

理想的国政,必须靠理想的君主来执掌。贾谊主张建立的国政,是定于一尊的皇权专制。为了使皇帝有绝对统治的能力,贾谊提出“阶级”的观念,以巩固并神化皇帝的地位。《阶级》篇里说:“天子如堂,君臣如陛,众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远地则堂高,近地则堂卑。

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列等，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施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势也。”在先秦，孔、孟主张建立等级制度，荀子主张用礼来维持贵贱等级，韩非则主张用法与刑。贾谊接受了他们的主张，但阐述得更为细致、具体。《等齐》篇说：“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服疑》篇主张“奇服文章，以等上下而差贵贱”。只有“等级既设”，才能“各处其检，人循其度”。“卑尊已著，上下已分，则人伦法矣。于是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瑰玮》篇也说：“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数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可见他主张设立等级制度，是为了别贵贱、明尊卑，达到不乱的目的。贾谊的尊君，与法家不同，法家的君主除了法不受任何人的制约，而法的最高权力，都操在皇帝手中，尊君是为控制臣下和百姓，使之强迫服从。贾谊主张建立的等级制度，在处理君民关系上，比前人更胜一筹。他从秦王朝的教训中，找到了解决君民关系的合理方法，就是建立一种和谐的君民关系。这种“和谐”，是在君臣上下必须遵守礼义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纳入大一统的政治轨道。皇帝的地位虽尊，但权力的行使，即是出于集体的意志和能力，而不是出于皇帝的个人意志。《官人》篇提出王者官人有六等：师、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这六等，不是爵位上的等级，而是随才能品格而来的所能尽的责任上的等级。“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与左右为国者强”，实际是主张人君集天下贤人的共同统治。《辅佐》篇把朝廷的政治结构分为上中下三等：大相为“上执正职”，大拂为“中执政职”，大辅为“下执事职”，还有道行、调谏、典方、奉常、祧师等，都有辅佐君主共同治政的责任。这更是从官制上对皇帝进行的一种制约，以免皇帝像秦始皇那样，“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过秦中》）。

贾谊根据当时国内的形势，分析了存在的社会矛盾，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贾谊以敏锐的目光，透过“政宽人和”、“天下富贵”的太平景象，看出了深刻的社会危机。针对那些至愚无知的谀者所说的“天下已安已治”，他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未安未治”，痛斥他们为“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数宁》）。

刘邦铲除异姓王，分封同姓王，成了文帝时治安的梗阻。当时诸侯王僭拟，地过古制，淮南、济北王皆为逆。故贾谊在《宗首》、《藩强》、《大都》、《益壤》、《权重》、《五美》、《制不定》、《淮难》诸篇中，分析了诸侯王为乱的原因，在于他们权足以徼幸，力足以行逆，而汉大国制度疏阔、地制不定，从而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藩强》）的策略，这实际是一种分散诸侯力量的政策。让“宗室子孙虑莫不王”（《五美》），从而达到“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的结果。以屠牛为喻，他指出“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制不定》）。在用仁义不能解决时，要用权势法制。他认为“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而“礼者禁于将然之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治安策》）。可见他主张用权势法制，乃是出于不得已，与法家重用刑法有本质区别，倒是与孔子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观点同出一辙。

贾谊的“削藩”主张，对汉代中央集权发生了重大的作用。贾谊死后四年，文帝把齐国一分为七，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削弱了诸侯的力量。景帝采用晁错的“削藩策”，先是消除了诸侯王的两个郡和六个县，“七国之乱”后，又把吴、越等王国分成若干小王国，汉武帝颁布“推恩令”，进一步缩小了诸王的领地，分散了他们的力量，又借故削夺了一百零六个列侯的爵位，基本上解决了诸侯强大难制的问题。这些基本是采用了贾谊的主张。

汉高祖时，匈奴就是北方一个强盛的民族，拥兵三十余万，经常骚扰边境。刘邦采用“和亲”政策，并每年奉送大量的金絮缯彩，才得以苟

安无事。文帝时匈奴又不断派兵侵扰，给中原人民造成很大灾难。贾谊认为匈奴是蛮夷，是天下之足（《威不信》），反对向匈奴屈膝求和，但又不主张兴兵讨伐，而是提出“三表五饵”，主张以德怀服。“三表”的具体内容是：用事势树立汉朝天子的信誉，使匈奴大众相信汉朝天子；用事势说明汉朝天子友爱匈奴人，使匈奴大众“自以为见爱于天子也，犹弱子之遇慈母也”；用事势说明汉朝天子爱好技术，使匈奴大众明白，只要有一技之长，“一可以当天子之意”。“五饵”的具体内容是：对匈奴使者及官吏之来降者，不但不歧视，反而给予优厚的待遇和宠幸，所谓“牵其手，牵其目，牵其口，牵其腹，四者已牵，又引其心”（《匈奴》）。“三表”、“五饵”的空想成份很大，但通过它，可以争取匈奴大众和一部分官吏同汉亲善，对阻止或减少匈奴贵族的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用仁义来处理民族关系，也是贾谊政治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治国以仁义为经，还必须以礼节为纬。贾谊认为“汉兴二十余年，宜定制度，兴礼乐”（《汉书·贾谊传》）。等级制度靠什么来维持，君臣上下的关系靠什么来协调？靠礼。实现理想的国政，必须建立上下共同遵循的规范，以形成共同的精神纽带，这便是礼。在《礼篇》里，他详细地阐述了礼的作用：“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故礼者，所以守尊卑之经、强弱之称者也。”“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治安策》）可见礼可以维护等级制度，是实行仁义的保证。礼，可以使上位尊，主位安，可以使民日迁善远罪。这些都是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主张。

礼的外部表现形式是“容”。为此，贾谊作了《容经》篇，详细规定了“志色之经”、“容经”、“视经”、“言经”以及“立容”、“坐容”、“行容”等各种生活礼仪；在《礼容语下》引用春秋时的故事，说明容合于礼的重要性。贾谊这些关于礼容的阐述，是从外部来约束人们遵守礼，这是先秦论礼的儒家没有具体谈及的。

贾谊面对汉俗日败的现实,主张推行礼乐使社会风气得以改变,即“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俗激》)。在《俗激》、《时变》、《孽产子》等篇揭露了世俗败坏的情况:“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无制度,弃礼仪,捐廉丑,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乎否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贼大母矣、踝姬矣、刺兄矣。盗者虑探柱下之金,掇寝户之帘,攘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拾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诸侯,此其无行义之尤至者已。”(《俗激》)要解救这种时弊,必须“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贾谊正是主张把礼推行到朝野之间达到淳化社会风气的目的。

经济是治国的基础。围绕着治国理想,贾谊在《忧民》、《无蓄》、《铜布》、《铸钱》等篇,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

当时的社会情况是:“农事不为,采铜日蓄……奸钱日繁,正钱日亡……鲸罪日积”,出现生产与消费的混乱局面。“富人大贾屋壁得为帝服,贾妇倡优下贱产子得为后饰”(《孽产子》)。总之,一方面是背本趋末,另一方面是严重的奢侈浪费,造成“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忧民》)、“公私之积,犹可哀痛”。贾谊深知“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无为奸邪盗贼,不可得也”。要想治国,必先安民(《孽产子》);要想安民,必须使民富足。“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无蓄》)要使民足,一要多生产,二要节制消费,以增加积贮。因此他把积贮提到关系国家安危的高度,《无蓄》篇说:“夫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向而不济?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柔附远,何招而不至?”如何做到积贮?第一要解决背本趋末的问题:一方面固定尚未附着在土地的农民,以改变愈加严重的背本局面;一方面运用政权的力量强制商人从事生产。“今驱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则天下各食于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瑰玮》),并主张收天下之铜,让民返耕田。第二要杜绝浪费,制止侈靡之风。要做到

这一点,就必须规定社会生活用品的等级制度。“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擅退则让,上僭者诛”,这样做就可以“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瑰玮》)。

贾谊的积蓄论重农观虽来源于先秦儒家和法家,但他不像儒家主张藏富于民,也不像法家主张藏富于国,而是综合了两家的观点,主张国家和个人都要有积蓄,更主张积蓄不是为了供统治者挥霍浪费,而是为了安定人民生活,保卫国家的安全。有了储备的粮食和财物,可以“攻则取”、“守则固”、“战则胜”,这是先秦以来财富概念的一个重要发展。

贾谊的重农思想和积蓄理论对后代产生了很大影响,晁错的贵粟论和重农理论就是直接继承贾谊思想并加以发展的。

在货币问题上,贾谊在《铜布》、《铸钱》两篇里分析了私铸钱币的危害。一、民造伪钱,触犯法禁,鲸罪日横。二、钱文大乱,钱用不信,民愈相疑。三、农事不为,采铜日蕃。提出由国家垄断币材——即收铜勿令布下的主张。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可以使民不犯盗铸钱之鲸罪,返耕于田,有利于农业生产,可以利用控制的币材,来调节、控制货币和商品的比价,达到稳定商品价格的目的。国家利用货币来操纵、控制各种商品的价格和供求,削弱“末民”的非法营利,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贾谊的这些主张,汉文帝并没有采用,直到景帝六年(前151)才禁止私铸。但是这些主张不仅为汉武帝统一铸钱做了准备,对汉代的货币思想也有影响,这是他在货币学说上的重大贡献。

贾谊的教育思想也是围绕治国理想来论述的,主要表现在《保傅》、《胎教》等篇。

太子是君主的继承人,因此太子的教育成为培养理想君主的重大问题。《保傅》篇里说,“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是他论述教育的立足点。《立后》篇记叙了立太子的礼仪,阐述了立太子的意义,是为了使天下有

天子。基于人性有善有恶的观点，他非常重视教育对人的改造作用，“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于楚之不能不楚言也”（《傅保》）。并强调及早教谕的重要性，主张实行“胎教”。《胎教》篇记叙了古代胎教之礼，并用古代许多君主因用贤与否使国兴亡的故事，从而说明君主所受教育特别是左右辅佐的重要性。《傅职》篇里，陈述了有关“傅”的各项具体要求和办法；《辅佐》篇陈述了各辅佐的职责；《连语》篇把人主分为上中下三等，指出中主得善佐则存，不得善佐则亡；都说明了环境、左右对君主产生的教育影响作用。《劝学》篇谓门人学者：“时难得而易失也，学者勉之乎！”强调后天的努力学习。

从贾谊的教育思想可以看出，他已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教育对人的改造作用，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各篇所述，主要讲对太子的教育，但是他的有关教育基本思想，当然也适用于一般的人。

贾谊的哲学思想，也是围绕着他的治国理想展开论述的。以前人们大都是据《鹏鸟赋》来论述他的哲学思想，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他因贬谪长沙一时而发的牢骚，因此才与老庄的“虚无”、“无为”思想发生共鸣而已。他的基本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道术》、《六术》、《道德说》等篇里。他在这些文章里提出的“道”、“德”等哲学范畴，是与人的伦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拿“道”来说，它具备了老庄之道那种虚无缥缈、生天生地的性质，又具有宋、尹学派之道那种涂上一层浓厚的伦理色彩的特征，并把它纳入治国的框架中去。《道德说》写道：“道者无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载物者，毕以顺理和适行，故物有清而泽。泽者，鉴也，鉴以道之神。模贯物形，通达空窍，奉一出入为先……”是说道虚无缥缈、存在于万物之中。道的这种高度抽象意义，不是他哲学思想中的主要内容，在更多的论述中，是伦理道德的同义语。《修政语下》说：“敢问于道之要奈何？……为人下者敬而肃，为人上者恭而仁，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以终其身。此道之要也。”贾谊所说的道，可以说是治道：《辅佐》篇

说：“大相上承大义而启治道，总百官之要，以调天下之宜；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以美风俗。”可以说是君道：《君道》篇在批评纣王杖诸侯之不谄己、桀文王的无“道”行为之后，指出：“《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鹄，而反修之于己。君国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备矣。”可以说是修身接物之道：《道术》篇对父子兄弟、待人接物等人际关系和恭、贞、信、平、公、私、仁、宽、安、良、轨、威、勇、怯、诚等范畴，用“道”作了伦理的规定，并总结说：“凡此品也，善之体也，所谓道也。故守道者谓之士，乐道者谓之君子，知道者谓之明，行道者谓之贤，且明且贤，此谓圣人。”贾谊道的伦理性质，也表现在他以“六”建立的思想体系中。道生德，德生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天地、人与万物皆六理所生，而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是用来表现天地、人与万物的，也就是表现六理。德具有六理的本质，同时具有六美的特征，而德之六美：道、仁、义、忠、信、密，也就是人的质量。这样，人的伦理，与天地万物的本源相融合，从中源源不断地导引出来，因而更加具有威慑力量，更加合法化。可见贾谊的哲学思想是他政治思想的基础，旨在形成人与自然、伦理与政治的和谐统一。

纵观贾谊前后的思想家，似乎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把立论的构建同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紧密结合。孔、孟、荀等人，仕宦不定，无法为哪一国提出具体的治国方案；韩非也只是发展了法家的理论。吕不韦的宾客们，提出了一套治国理论体系，作出一种尝试，但与秦始皇的法治大相径庭。只有贾谊，顺着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潮流，吸收发展了前人思想，在对秦王朝兴衰盛亡的分析总结、对现实矛盾危机的洞察剖析的基础上，构建成一个完整的治国立论体系，为董仲舒建立儒学新体系打下了基础。这就是《新书》表现的贾谊思想的价值所在。

三、《新书》的真伪及版本

《新书》的真伪问题，以前学者众说纷纭。但概括言之，可分为两种

主要的对立意见：

一种认为，今本《新书》已非《汉书·艺文志》及《贾谊传》中所说的五十八篇，乃是魏晋以后人所伪编，其中一部分为割裂《贾谊传》及《食货志》所引的奏疏，加上标题，凑合而成。主此伪书说者，可以宋陈振孙（见《直斋书录解题》）、清姚鼐（见《辨贾谊新书》）及《四库全书提要》等为代表。他们的理由，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一）《汉书》中所引贾谊的疏文，条理通贯，而凡《新书》中非引自《汉书》的部分，则浅驳不足观。

（二）今本《新书》中有些词语，与西汉时代不合。如姚鼐说“易王后曰妃，自魏晋始”；又曰“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

（三）今本《新书》中有些内容与《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相雷同，是《新书》以这些书为源本，因为《新书》的这些部分较之诸书为略。

另一种与前者针锋相对，驳斥了伪书说。认为今本《新书》即《艺文志》和《贾谊传》中所说的五十八篇，亦即刘向删定本；但今本仅存五十六篇，又《问孝》有录无书，则佚三篇。主此真书者，自宋代朱熹、王应麟、黄震等人开始，而余嘉锡、魏建功、王洲明等人论之最详。他们所说的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贾谊作品流传的情况看：自汉至宋有著录，贾谊作品在汉代就被司马迁、董仲舒、韩婴、刘向、戴德、班固所引用，在《汉书》和《后汉书》注里也征引了贾谊书的语句，并且宋以前的类书，如《意林》、《北堂书钞》、《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也征引了贾谊作品，其内容和篇目顺序皆与今本《新书》大体一致，可见同出一个系统。

（二）持伪书说者认为有些词语与西汉时代不合，这是误解。“妃”字不作“嫔妃”、“妃子”解，而应为“匹配”、“配偶”义，《尔雅》、《说文》、《礼记》、《左传》皆有例证。汉朝廷已袭用秦制，称皇帝为陛下，这在《汉